

陈聆群 著

八十回望

我的音乐历程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中央财政支持国家重点学科“音乐学特色重点学科（理论）”建设项目资助

陈聆群
著

八十回望

我的音乐历程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八十回望:我的音乐历程/陈聆群著. —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4.5

ISBN 978-7-80692-774-8

I. ①八… II. ①陈… III. ①陈聆群—回忆录
IV. ①K825.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43702 号

- | | |
|------|-----------------------------------|
| 书 名 | 八十回望——我的音乐历程 |
| 著 者 | 陈聆群 |
| 责任编辑 | 夏 楠 |
| 封面设计 | 沈幻仙 |
| 出版发行 |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
| 地 址 | 上海市汾阳路 20 号 |
| 印 刷 | 上海天华印刷厂 |
| 开 本 | 720×1020 1/16 |
| 字 数 | 180 千字 |
| 印 张 | 11 |
| 版 次 |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978-7-80692-774-8/J. 909 |
| 定 价 | 42.00 元 |

本社图书可通过中国音乐学网站 <http://musicology.cn> 购买

目 录

一、懵懵懂懂踏上音乐路 / 2

1. 当上文工团员的艰难历程 / 2
2. 学写歌学二胡都只开了个头 / 8
3. 学 Cello 当指挥都是“三脚猫” / 12
4. 从戏曲音乐学徒到奋力考音乐院 / 16

二、集体编史的坎坷历程 / 25

1. 集体编史是怎样搞起来的? / 25
2. 关于讨论中国现代音乐史写作大纲的回忆 / 30
3. 忆学习讨论矛盾的《夜读偶记》 / 33
4. 反思访谈资料的遗憾 / 40
5. 不会忘记陈又新吴永刚先生赠我们珍贵史料 / 46
6. 回顾《中国现代音乐史(1919~1949)》的稿本写作(上) / 48
7. 回顾《中国现代音乐史(1919~1949)》的稿本写作(下) / 55
- [附录]《中国现代音乐史(1919~1949)》未定稿编写进程 / 60

三、五味杂陈回望“德彪西讨论” / 65

1. 我在“德彪西讨论”中看到听到的 / 65
2. 在“德彪西讨论”中我写了什么? / 68
3. 我为“德彪西讨论”得到的不同罪名 / 70

四、十年浩劫醒迷梦 / 74

1. 我成为“批贺”写作组主要写手的痛切感受 / 74
2. 上音园十年浩劫众生相 / 81
 - (1) “炮打”大罪名重压下的上音人 / 81
 - (2) 有责总逃有利总到的“好干部” / 83
 - (3) 为上音园默默奉献一生的老校工 / 86
 - (4) “牛棚”内外的黑色幽默 / 88
 - (5) 三小“牛鬼”推好草坪听“隔壁音乐会” / 89
 - (6) “陈半仙”银针救急和背黑罪名写红曲 / 91
 - (7) 惊恐纠结防追“防扩散” / 93
 - (8) “1.13/1.14 指示”给上音园带来腥风血雨 / 94
 - (9) 吃早饭活下去为了替人作证 / 95
3. 痛定思痛话教训 / 99
 - (1) “文革”写作组是干什么的? / 99
 - (2) “群众运动=群众专政”让上音园成了什么? / 101
 - (3) 我的主要教训:很不理解一信以为真—过分卖力 / 103

五、踏上永无终点的中国音乐史学之路 / 105

1. 《中国民主革命时期音乐简史(1840~1949)》的编撰 / 105
2. 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术讨论会”上的反思检讨 / 108
3. 关于《反思求索 再事开拓……》一文的写作发表 / 111
4. 探索太平天国音乐史事的收获 / 115
5. 曾志恣—犹待探索研讨的先辈音乐家 / 118
6. 从得见《音乐小杂志》复印本说起 / 123
7. 为萧友梅编文集全集留下遗憾 / 126
 - (1) 三个老同学为学校创始人编文集 / 126
 - 〔附录〕追思贺绿汀老院长支持我们编《萧友梅音乐文集》 / 133
 - (2) 纪念萧友梅 110 年诞辰中山之行的前前后后 / 137
 - (3) 受命赶编《萧友梅全集》留下遗憾 / 142
8. 《中国近代音乐简史》电视教材的编录播出 / 145
9. 诚惶诚恐身负研究生导师重任之后 / 155
- 〔附录〕沈知白先生谈王光祈及其他 / 162
10. 我对应当探讨中国音乐如何向近现代转型的期望 / 164

后记 / 171

1932~2012,陈聆群八十岁了!

回过头来望,我怎么会学音乐,做音乐工作,而且还成了教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真是不可思议!

那么,我是怎么会一步步踏上这条路的呢?

一、懵懵懂懂踏上音乐路

说我做音乐工作不可思议,是因为祖籍江苏吴江芦墟镇白荡湾村,而出生在上海的我,自小就没有得到过音乐的熏陶;我的父亲陈孟豪是做报纸编辑工作的,母亲归青田当过教师,也在报社工作,他们都似乎没有音乐方面的爱好,也就没有给予我这方面的影响。

我有清晰记忆,是在1937年“八·一三”事变,我随母从上海逃难到乡下那年,就是在那时,我从下乡来宣传抗日救亡的城里学生那里学会了唱《义勇军进行曲》,这应该是我记得起来学会的第一首歌;但是,幼小的我只知道这是教我们打“东洋赤佬”的歌,连歌名也没听懂,而且把“冒着敌人的炮火”唱成了“冒着嘀粒粒炮火”,当然也没有听说过这首歌是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就连歌是由人作出来的,也没有听说过。知道歌是由人作出来的,是一直到当上了文工团员才有人告诉我的;那可是经过了艰难的历程,才当上的啊!

1. 当上文工团员的艰难历程

抗战胜利那年的1945年7~8月间,妈妈拖带着我和大妹妹陈师节(我那年12岁,大妹小我两岁),从浙西分水县合村,随着人流步行、挤车、搭船,像逃难一样回到上海。后来妈妈告诉我,那是因为在这之前的1945年初,爸爸接到原来单线联系的胡秉钺(我更小的时候在家里见过,因为此人一手有六个手指而印象很深),写信来约到分水见面,当时以为失去联系的组织找上来了,便与妈妈带着我和大妹赶去,谁知此人早就叛变投了忠义救国军,他是知道爸爸熟悉上海新闻界,想在抗战即将胜利进上海后借力得“劫收”之利;知道受骗,爸妈只好分两路,由妈妈带我和大妹回上海,在爸爸另路回沪后再作安排。所以我印象中那次回到上海,爸爸妈妈带着我们三天两头老是搬家,后来知道那是为了甩掉那个六指

胡秉钺,另找关系到解放区去。就在那年的9月初,爸爸妈妈再次分开,由妈妈带着我和大妹(小妹陈憬纾一后更名陈抗一幼小,只好留在家乡托大伯母照看),从上海乘火车到蚌埠,在那里取道到淮北——华中解放区,与另路前往的爸爸约好在淮阴(时为华中解放区首府),再行会合;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了与童年全然不同的生活。

应该就是从蚌埠过了淮河,在洪泽湖的船上,我听到了一首歌:

别处哪儿有

1=D $\frac{2}{4}$

中板

史 白 词
沈亚威 曲

$\parallel: 6$	$\underline{\dot{2} \ \dot{1}}$	$ 6$	$\underline{6 \ \#5}$	$ \underline{6 \ 3} \ \underline{5 \ \dot{1}}$	$ 6$	-	$ $
千	条	船	呀	万	条	船,	
布	朝	北	呀	米	向	南,	
6	$\underline{\dot{2} \ \dot{1}}$	$ 6$	$\underline{6 \ 5}$	$ \underline{3 \ 6} \ \underline{5 \ \underline{\dot{1} \ \dot{2}}}$	$ 3$	-	$ $
千	条	万	条	来 往 象 梭 穿。			
朝	北	向	南	只 报 一 道 捐。			
$\dot{3} .$	$\underline{\dot{3}}$	$ \underline{\dot{2} \ \dot{2}} \ \underline{\dot{2} \ \dot{1}}$	$ \underline{6 \ 6} \ \underline{\dot{1} \ \dot{3}}$	$ \dot{2}$	-	$ $	
除	了	解 放 区,	别 处 哪 儿 有,				
$\dot{3} .$	$\underline{\dot{1}}$	$ 6$	$\underline{\dot{2} \ \dot{1}}$	$ 6$	-	$ 6$	- $ $
哪	儿	有。					

歌声是那样的悠扬清新,好像是从天上飘下来的,与我从小在上海听到的那种喧嚣嘈杂的市声全然两样,我很快就跟着唱,学会了,一直哼着唱着;但是我并不知道这首歌是谁作的,还以为天然地飘着这样一首歌呢!

我们过了洪泽湖下船上岸,在第一个路口就见到,有像今天电影里看到过的敌后武工队打扮的人,打着“八”和“四”的手势(后来知道那是问我们找八路军还是新四军)上来接应,后来经过的每个村庄和城镇,也都有这样的人接应,他们对我们非常亲切,尤其对我和大妹喜爱抚慰,问长问短,让我们有到了家的

感觉,就这样把我们一站站接应到了宿县城里;后来知道,当时那里是新四军第四师师部所在地,妈妈带领着我和大妹,是到淮北区党委的“城(市)工(作)部”来报到的。

我们在宿县只停留不长几天时间,我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是在城工部的墙上第一次见到了朱总司令和毛主席的大幅木刻画像,还有另一幅新四军第四师彭雪枫师长的画像。应该是城工部的人让我们认识了朱总司令毛主席,还向我们讲了彭师长的故事。印象中我们还看过一次拂晓剧社的演出,演的什么节目想不起来了,但对断断续续听到的彭雪枫师长英勇善战、创建骑兵团和不幸中流弹牺牲,又创建以“拂晓”为名的剧社与报刊等却记忆犹新,在我心中形成了一个文武全才的英雄形象。不过,接下来的安排,是妈妈带着大妹到淮阴去,与先期到那里的爸爸会合(后来知道爸妈进了新华社华中分社的干部学习班,大妹则送进了汪达之创立主持的华东干部子弟学校,又再转到了也是由他创建的新安旅行团),而我则由城工部派人送到淮北四中就读;这样,我就开始经受了第一次离开父母的艰苦生活的考验。

淮北四中设在一所寺庙的大殿里,学生都就地睡干草垫的大统铺,每天除了集体出操和安排学生劳动——拾柴、担水等之外,就是上不分班级的大课;老师讲的话我听不大懂,而就我听得懂的,觉得课的程度太浅(如:常问刚才讲的这个字怎么写啊?连我小学没毕业的都觉得太“小儿科”了)。更为艰难的是第二年淮北遭了春荒,学校断粮,只能靠拾野菜、扒榆树叶和向油坊要一些榨油剩下的干豆饼,三天两顿地度日子;这对大多数从本地农村来的学生来说都能适应,而让我这个从上海来的,觉得是“食咽不下,便拉不出”,没有多久就患了急性疟疾,在好不容易治愈后,学校就把我送到淮阴我父母身边了;我的第一回离开父母艰苦生活的考验,以败下阵来告终。

我应该是在1946年的3~4月间,被送到淮阴的,当时大妹已被送进干部子弟学校,我随母同住在她的集体宿舍里;而爸爸妈妈在新华社干部学习班成天学习开会,我就一天到晚到处游游看看,有的时候跟随爸妈到那里唯一的大会堂里,或参加大会,或看演出。当时淮阴在举行文教大会,演出很多,留在我这个“不请必到”的“编外小观众”脑海里,印象最深的是话剧《甲申记》的演出;现在知道那是根据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创作,由华中军区的前线剧社演出的,剧中有好些插曲,正是由《别处哪儿有》的作者沈亚威谱写的,但我当时根本不知道,也不会找人去问,不然的话,也许会早一些懂得歌是由人作出来的。

在淮阴呆了不多久,爸爸妈妈为我联系好,请一位沭阳县的负责干部(记忆中好像叫吴觉),借他回程马车之便,把我带到沭阳,送入那里的淮海中学就读;于是我从1946年的4月中起,又开始了离开父母的磨练,而且一直到解放战争胜利,我与爸爸妈妈还有大妹,始终互不知道各到了哪里。

淮海中学在沭阳城里，比淮北四中条件好了许多，课程设置和课上课余的生活也相对正规，因此我很快适应和稳定了下来，而这又与我遇到了一位好同学的带领帮助有关。这是比我要大上一两岁名叫李海城的同学，和我住同一宿舍的同一长炕铺位，每天带我起床漱洗，体操跑步，上下课，做游戏，进食堂……遇到我受人“欺负”，比我高大强壮的李海城，便会“拔拳相助”。更让我难以忘怀的，是一次发现我们睡觉的土炕下爬着许许多多尾巴带毒勾的蝎子，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害怕极了，而李海城却说蝎子抓起来卖给中药店可以换钱，便带着我到了晚上点上油灯，掀开土炕，用铁钳一只又一只地把到处爬动的蝎子钳进瓦罐里，第二天果然用许多罐蝎子从中药店换来了不少钱。让我佩服李海城的本事大，更因为在临近暑假的时候，沭阳城外发了大水，我们上城头向四郊望去是一片汪洋，却又见田地里高出水面的一个个坟头上，都爬满了被大水“赶”出来的一只只大大小小无助的兔子，我只是觉得好玩，李海城却弄来了一只大木盆，坐在里面划到近处的坟头边上，捉来了好几只兔子，除了杀掉以后煮了美味的兔肉以外，剥下来的兔皮弄干了以后，做了好几顶冬帽的兔皮耳套，还给我做了一副，后来我在北撤途中一直戴着它。

这位做过我的“保护神”，本事很大的李海城，当时我只知道他是当地的一位干部子弟，解放战争一开始与他分开以后，也一直没有联系。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我在中央音乐学院偶遇原在上音音乐研究所就读，我也教过的高建进同志，交谈中对我说起，她的丈夫李源潮的哥哥李海城，对她提起与我在淮海中学同过学；在她的联系安排下，李海城与我得以在老舍茶馆饮茶欢聚，畅谈一别数十载彼此经历的沧桑巨变。

我在淮海中学就读到1946年的6月，暑假刚开了个头解放战争就爆发了，未及与爸爸妈妈联系，我就被编入了由二三十位师生组成的宣传慰问团，这是开始带有志愿性质，后来列入正式编制，专做动员支前民工宣传慰问工作的团体；而我印象最深的，是将近1946年底，与宣慰团一起参加了宿北战役最前线的伤员护理与转送工作，就是在靠近火线的一个大树林里设的伤员转送站，为从火线抬下来的伤员做初步的护理，再交给民工担架队转送到后方去。我当时被分配为抬下来的伤员洗脸和喂食，在枪炮声密集交加之下，隔两三分钟就抬来一副担架，我们都日夜手脚不停地紧张工作着，有时我为伤员洗着脸发现他已经牺牲了，只好报告伤员转送站的负责人，关照抬到后方安葬；也有民工抬着空的担架下来，说他们发现抬的是国民党的广西伤兵，被他们从担架上掀翻到沟里去了，那也得报告领导，说服民工回去寻找再抬回来。

这次持续一周多最靠近火线的紧张工作，让我得到了锻炼，接下来北撤山东，又让我经受了更严峻的考验，也让我又遇到了护卫助我成长的战友。那是在宿北战役歼灭国民党军数万并成功阻击之后，淮海区好几个县的学校随军北撤的师生，

在寒风凛冽飘着雪花的夜里，聚集在一个大广场上紧急列队，以口令一二三四……报数，迅速形成十数个各近二三百人约为营的编列，由事先指定的各队负责干部带领，以急行军速度，各队间隔一定距离，连夜越过陇海铁路线北撤山东。我背着不算小的被包随队急走，不知走了多久，所在队伍与前后队伍都联系不上而走迷了路，便把队伍带到一处村庄暂歇，以寻找带路的老乡。跑得疲乏不堪的我，靠在墙角很快瞌睡过去，待到突然惊醒，发现队伍不在了！这可不得了！因为国民党军就在后面追着，如果走错了方向和道路，后果不堪设想；幸好，当时我并没有乱了方寸，走出村庄以后，我心想北撤北撤总是朝北走，而刮着北风飘着雪花，只要顶着风雪总归是朝着北方跑的，我就顶着风雪一阵急跑，更为幸运的是大队走去不远，被我追上了；而当我回到队伍以后，由于临时编列互相还不很熟识的队伍中人，竟还没有发觉我掉了队。

因为这次事故，队领导便安排了一位专门负责带领照顾我的大同志，叫马乃康，是沭阳县人，也许当时就是共产党员（此时党支部还未公开），他年长我五六岁，身强力壮，从此，一到行军他就把我们两个人的被包一起背着，遇到难走的地方扶着我拉着我，不让我离开半步，宿营了怕我冻着，有时与我同一被窝，吃饭了怕我饿着或吃不好，凡是好一点的食物便让给我吃，处处护卫着我，从那时起直至我们北撤到了胶东解放区，在敌人将要重点进攻胶东之前，他才因为参军而与我分开。马乃康在上海解放以后，曾经到当时我所在的新安旅行团来看望过我，告诉我他在上海市公安局工作；“文革”后我也打听过他，听并未得到证实的传言，因为马乃康担任过陈毅陈老总的警卫员，“文革”中挨整遇害！我愿祝祷：期望这位大哥哥一般护卫我走过解放战争最艰难路程的好同志并未遭难，而还像当年那样精神抖擞地在照应着他的亲友同志。

北撤进入到沂蒙山区的初期，我所在队驻在一处名叫“白石窝”的村庄较久，这座村庄在海拔一百来米的半山腰，到处可见白色的山石（村庄因此得名），净水全靠从凿得很深的井里，用瓦罐吊上来饮用，因此轮值到借老乡的瓦罐吊井水，人人都提心吊胆，因为很容易碰碎瓦罐，却又无处可买连赔都赔不出；我虽然年纪小，不用轮值吊水，也常在马乃康等轮值时一同担忧。在白石窝还可看到不少老乡脸上手脚上长着白斑，队里有一位卫生员说，这里的饮水一定有问题，所以老乡会患白癜风。果然，在我们离开白石窝继续北撤的途中，队里好几位同志脸上身上生出了白斑，有的还很严重；而我却比较幸运，因为虽然也生出了白斑，却只在左额头上添了一点长白头发的小白斑，且没有蔓延发展，只是从此我得了一个“小白毛”的绰号，直到今天七老八十了，当年的老战友见面还以此相称。

我们来自淮海区各县学校师生的北撤编列各队，约于1947年的初夏，到达胶东解放区的海阳县，在昆嵛山脚下一座叫“北城阳”的特大村庄驻停下来，在这里统

一整编为“华东建设大学附属中学”，开始了分班级设课程上课和军训与劳动的军事化学习生活，这里地处渤海之滨昆崙山下，农林渔都兴而粮果海产丰盛，又是老解放区，我们在这里不仅吃住较好，而且从参观当地正进行的土地改革等受到教育，又得到老革命乡亲们的深情感染，加上解放战争节节胜利，捷报频传，人人情绪高扬，可以说在这里度过的是北撤之后最为舒心畅快的时光。但是，这样的日子并没有多久，1947年夏秋之交，国民党军妄图挽回失败，开始“重点进攻”胶东解放区，建大附中便在这时宣告停办，除了年龄较小的和不同原因不适合上前线的以外，像马乃康那样身强力壮的，都在这时报名参军开拔赴战，而我在以后又经历了一番新的考验。

参军的同志们开赴前线以后，我们留下来的被分散隐蔽到本地可靠的基本群众家里，我被安排到北城阳附近小山村的一户贫农家里，在这家土改中翻了身的大爷大娘和他们的女儿（是一位大爷大娘呼之为“嫚”的姑娘），对我亲人般照料保护下，生活了一段时日。我换上大爷大娘给我的衣服，每天跟着我称之为“姐”的“嫚”劳动，或上山拾柴，或下地刨地瓜，干得挺欢。大爷大娘和嫚姐常为我煮我觉得最好吃的地瓜面，以虾卤拌食，真把我当成他们的儿子和弟弟了。而这时传来了跟着国民党军回来的“还乡团”非常残暴的消息，他们对本乡本土的翻身农民反攻倒算，残酷报复，制造了许多起把全村翻身农户杀绝的惨案。为了消除隐患，当地党政军领导布置了应对“国民党军攻来了”的演习，就是半夜里突然枪炮声大作，隐蔽着我们这些被称之为“南方学生”的各家翻身农户，便牵着事先准备好架着财物的毛驴，带领着我们这些南方学生迅速朝山上跑，当遇到装扮成的“国民党军”包围和逼迫交出“共党”时，就能试出是否有人向国民党军与还乡团指认或告密。但这样的并不事先告诉我们和翻身农户的演习，只进行了一回，就让翻身农户们以为不信任他们而大为不满，也让我们这些“南方学生”觉得这样隐蔽太不安全，如果国民党军和还乡团真的攻来，是立刻就会暴露的。

就是在这样的演习之后不多久，我得到召集，告别了大爷大娘和“嫚姐”，与二三十位也是分散隐蔽在翻身农户家的南方学生集合在一起，组队另行寻机拟从胶东突围出去。我们先是朝海边走，想走海路乘船渡海到东北解放区去，但是在作好充分准备，上了很大的海渔船驶出去并不多远，就碰上国民党的军舰封锁了港口海面，只好折回上岸。接下来又有多次走走停停寻机觅路的突围，到了1947年入冬将年年底的时候，我们来到



招我进三野文工一团的
王谦(王千)

了靠近胶济铁路线,过了路就是渤海解放区的一处村集,在那里遇到了三野文工一团派来招收学员的王谦同志(时名王千),我就幸运地被招,与同时被招的——记得有后来创作了《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等歌曲的朱南溪同志和后来成为他夫人的徐明同志等——在王谦带领下,越过胶济路到渤海解放区,进三野文工一团报到了。

经过这样的艰难历程,我终于在1947年底得进三野文工一团,由学员而成正式的文工团员,成为我得以踏上音乐之路的重要契机。

2. 学写歌学二胡都只开了个头

1947年底,我从胶东解放区被招进到三野文工团一团当学员,在见到我们的团长沈亚威的时候,有人告诉我:“陈聆群!你一天到晚唱的《别处哪儿有》就是他写的!”我大吃一惊!怎么!歌是由人写出来的?!这么好听的歌原来是沈亚威写的!接下来好些天,我一有机会就傻傻地跟在沈亚威团长后面看,以致沈团长问



沈亚威

我:你这个小鬼怎么老是跟着我啊?有人告诉他:陈聆群喜欢你写的歌啊!于是在沈团长为我们新招来的十来个学员上音乐课的时候(就是教我们简谱乐理和歌咏指挥法),就讲了大意如下的故事:

陈聆群喜欢我写的歌,其实你们都可以学会写歌的。我是在皖南事变之后跟随突围部队北撤的时候,部队首长见战士们一路闷走,不像以前那样歌声不断,说这样不行,就给我一首歌词,要我一定要谱出一首歌来,让战士们唱起

来。我当时会指挥歌咏,也唱过许许多多歌,却还没有谱写过歌呢。但是,部队首长交的任务必须完成,我就在轮班站岗的时候,面对着村边的树林,一遍遍大声朗读给我的那首歌词,再试着唱出这首歌词,唱着唱着,居然让我唱成了一首歌,第二天就在队前教唱,战士们唱着我为谱的第一首歌一路北撤;你们看,写歌并没有多么难的啊!

沈团长还给我们讲了北撤以后,他谱写出《黄海渔民曲》等更多歌曲的故事,在他的教课将要结束的时候,发给我们一首歌词,是从当时部队驻地墙上抄下来的一首“墙头诗”:

蒋介石，是一个大独裁，
像只破船下大海，东一歪来西一歪，
民主的浪潮打过来，船沉海底泥里埋。

沈团长要我们用这首墙头诗谱出一首歌来，作为我们学习结业的成绩（这样既能测试我们用简谱记录所作歌曲的能力，也增强我们学音乐的兴趣）。于是，我就照着沈团长讲的故事，也跑到村边的树林里，一遍遍朗诵这首墙头诗，再试着把它唱出来，唱着唱着，居然也给我唱成了一首歌，在结业的课上，沈亚威团长以我交的歌为例，进行了讲评和整理修改，成为了以下这样一首歌：

墙 头 诗

$\dot{2}=d \quad \frac{2}{4}$

陈聆群谱

$\dot{2} \quad \dot{2} \quad | \quad \dot{2} \quad 0 \quad | \quad \underline{\dot{2} \quad \dot{3} \quad \dot{3}} \quad \dot{1} \quad 6 \quad | \quad \dot{2} \quad 0 \quad |$

蒋 介 石， 是 一 个 大 独 裁，

$\underline{\dot{2} \quad \dot{3}} \quad \underline{\dot{2} \quad \dot{1}} \quad | \quad \underline{5 \quad 6} \quad \underline{5 \quad 3} \quad | \quad \underline{2 \quad 1} \quad \underline{2 \quad 3} \quad | \quad \underline{5 \quad 6} \quad 5 \quad |$

像 只 破 船 下 大 海， 东 一 歪 来 西 一 歪，

$\underline{\dot{2} \quad \dot{1} \quad \dot{1}} \quad \underline{\dot{2} \quad \dot{3}} \quad | \quad \underline{\dot{2} \quad \dot{1}} \quad \underline{6 \quad 5} \quad | \quad \underline{6 \quad 5} \quad \underline{6 \quad \dot{1}} \quad | \quad \underline{5 \quad 6} \quad \underline{3} \quad |$

民 主 的 浪 潮 打 过 来， 船 沉 海 底 泥 里

$2 \quad 0 \quad | \quad \underline{\dot{2} \quad \dot{1} \quad \dot{1}} \quad \underline{\dot{2} \quad \dot{3}} \quad | \quad \underline{\dot{2} \quad \dot{1}} \quad \underline{6 \quad 5} \quad | \quad \underline{6 \quad 5} \quad \underline{6 \quad \dot{1}} \quad |$

埋， 民 主 的 浪 潮 打 过 来， 船 沉 海 底

$\underline{5 \quad 6} \quad \underline{3} \quad | \quad \dot{2} \quad 0 \quad | \quad \underline{\dot{2} \quad \dot{2} \quad \dot{2}} \quad ||$

泥 里 埋， 泥 里 埋！

得到沈亚威团长认可的这首短歌，当时让我得意到几乎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了，但现在分析起来，却并不能说明我真有写作歌曲的“天份”。除了沈团长教我们反复朗诵歌词，从词的语音声调中自然引发出歌的声韵旋律，符合于以汉语韵文谱曲的基本规律，也就是教给了我们谱写歌曲的入门诀窍之外，其实短歌的旋律

因素正来自于当时我念念不忘的那首《别处哪儿有》，还有就是当时我们几乎天天在唱的朱践耳的那首解放战争的胜利欢歌《打得好》：

打 得 好

$\dot{2}=d \quad \frac{4}{4}$

$\dot{2} \cdot \quad \underline{\dot{1}} \quad \dot{2} \quad \dot{5} \quad | \quad \underline{6.7} \quad \underline{65} \quad \underline{67} \quad 6 \quad | \quad \underline{\dot{1}} \quad \underline{\dot{1}} \quad \underline{6} \quad \underline{56} \quad \dot{1} \quad | \quad \underline{32} \quad \underline{35} \quad \underline{\dot{1}3} \quad 5 \quad |$

打 得 好 来 打 得 好 来 打 得 好，四 面 八 方 传 捷 报 来 传 捷 报，

$6 \cdot \quad \underline{5} \quad 6 \quad \dot{1} \quad | \quad \dot{2} \quad \underline{6} \quad \underline{\dot{1}} \quad \dot{2} \quad \dot{5} \quad | \quad \underline{\dot{3}\dot{3}} \quad \underline{\dot{3}\dot{5}} \quad \dot{2} \quad 6 \quad | \quad \dot{1} \quad - \quad \underline{\dot{2}\dot{2}} \quad \underline{\dot{2}} \quad ||$

到 处 都 在 打 胜 仗，嗨，再来一个打得好，打得好！

陈聆群按：此非原谱，是我记忆中的此歌选录

其中也不难听到我写的那首短歌，在不知不觉中“偷”过来的音调与节奏因素。任何一种创作总是有自觉不自觉地借自前人和源于前人的来由的，并不能仅仅依靠于什么个人的“天份”，这是今天我回望这首短歌所应该记取的。

其实，从我写出这首被沈亚威团长认可的短歌之后，并不就此热衷于写歌，而是很快就转换了感兴趣的对象，就可以说明我还远没有入音乐之门呢。在三野文工一团，让我钦佩之至的人，并不止沈亚威团长一个，还有把我们从胶东招来领到三野文工一团的王谦一时称王千，一开始作为我们学员队的指导员，一天到晚带领我们出操行军，他能教歌写歌、排戏表演，又会拉京胡唱京戏，行军途中一到休息，就到处又拉又唱，活跃非常，大家都很喜欢他，我也因此把他当作自己崇拜仿效的对象。而在写出得到沈亚威团长讲评修改的那首短歌之后，我很快又惊奇地看到了团里还有一位高人——那是每逢团里为部队演出，在两个节目间歇，战士们就热烈鼓掌欢迎出来表演二胡与小提琴独奏的张锐，他坐在大幕前面，对着静候他表演的成千上万的战士们，总是先独奏二胡——真正的没有任何伴奏的独奏，往往要奏上好几个曲子（现在知道奏的就是刘天华的二胡曲和陆修棠的《怀乡行》——这往往是放在最后独奏的一首），战士们才肯放他过门；而逢到战士们仍旧不停地鼓掌欢迎，张锐就会拿出小提琴来独奏上一曲，同样会得到战士们一再鼓掌要求加演——可见大多数为农民出身的战士们，也欢迎新的甚至“洋”的器乐表演。每每看到张锐为战士们“沉醉”一般地独奏着，奏到得意之处就微微抬起头来“灿然”一笑，真觉得我又逢“神人”，于是我又像对沈亚威团长那样，一有机会就傻傻地跟在他后面看，尤其是当他练习二胡或小提琴的时候，我怎么也得赶到他跟前又看又

听。记忆中,一次团里请来了两位河南坠子的艺人,我们在沈亚威团长的安排下,一起观摩他们的表演;在不多久后的一天,我忽然看到听到了张锐在拉从艺人那里购来的坠子,是那样的好听,奏得比那两位民间艺人还要好,当时我也许是忍不住发出了赞叹之声,于是张锐就像沈亚威团长一样问我:陈聆群你怎么老是跟着我啊?我便不好意思地说,我想跟你学拉胡琴。真是幸运哪!张锐同志当即同意教我,而且借给我一把二胡,让我先从空弦拉起来,说只要你拉到不再像杀鸡一样的了,我就收你这个二胡学生。这让我多么的开心啊!我不管不顾地只要有空有机会,就抱着二胡拉起来,没多久就拉得有点意思了。

但是,我却没能能够当上张锐老师正式的二胡学生,那都是因为一次“乐极生悲”的事故:在1948年4~5月间,三野文工团的一、二、三团同三野政治部与司令部,都驻在当时属河南的濮阳县境内,我在参加了“三查三整”以后,已经听到宣布获准列入可以随大部队开赴前线的名单,因此更舒心地沉迷于练习二胡;一天一大早,我就坐在驻地村头一条长凳子上拉二胡,拉啊拉啊,听到有人唤我便站起来应声,不料那条长凳只有三条腿,一下子倒下来砸在我脚背上,不好了!脚背肿了!不能行军了!当然不能跟随大部队开赴前线了!于是被决定,由因为身体欠佳也不能上前线的同团陈晓虹同志背着我,调到附近驻地的新安旅行团报到,不用说,我就只好与沈亚威、王千等等崇敬对象告别,也当不成张锐的二胡学生了。“命中注定”,我真正踏上音乐之路还要大费周折。



张锐拉二胡

这里还要补充,在三野文工一团短短不过半年多点的时间里,在我心田里播上音乐种籽的,除了沈亚威、王千和张锐,对我印象尤深的还有,在三野文工一团与好些部队的地方的文工团队,汇聚在濮阳县境内,为当时朱总司令前来参加的军事会议演出的那些天里,我常看到听到属于我们三野文工总团的大型铜管乐队(当时叫军乐队)的演奏,奏的是以一些军歌或合唱改编的军乐曲,如《八路军军歌》、《新四军军歌》和《勇敢队》等等,而我最喜欢听的是《八路军进行曲》(后称《解放军进行曲》,今已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尤其每次都等着奏到“听!风在呼啸军号响”的旋律处,听小号奏出 $\underline{5\ 6\ 7}\ \underline{1\ 2\ 3\ 4}\ \underline{5\ 6\ 7}\ \underline{1}$ 的快速上行华彩乐声,觉得精神为之一振;当时并不知道包括这首乐曲在内的军乐曲,都是朱践耳编配的,我当时也不认识不曾见到过他,但这样的聆听,让我对音乐还有如此广大奇妙的天地,产生

了向往。

在来到濮阳之前,我随三野文工一团经当时黄泛区来到黄河渡口,在那里连续好几天为渡河部队做鼓动工作的经历,也是深刻在我心底的记忆,决不会磨灭的。黄泛区是蒋介石以阻挡日本侵略军为由,下令炸开花园口,造成黄河大决口而形成的。我们以急行军速度来到那里,踏上了如同猪肚皮那样晃动着,一停步就会陷下去,又绵延数十里的黄河河床里的沙土地,赶到了一处黄河渡口,面对着如大海般望不到边际,又流淌着几股方向不同急湍如箭的黄水激流,我们在以高粱秆玉米秆编成长帘搭成的鼓动棚里,为连日连夜整团整营开来的三野渡河部队做宣传鼓动工作,部队登上十来条硕大无比可载整营战士像方盒子般的大船,都各由十来个常常赤条条如“浪里白条”的船工操控着,先要推着拉着大船朝上游驶十来里,再将大船推向河中央水的流向不同的主流,借水势将大船驶向对岸渡口;在这滔滔急湍的黄水如万千野马嘶叫奔腾,无边无沿的天空河面常似烟雾般迷漫着细雨,大河里又演绎着人船与激流搏斗且惊又险的场面,我们文工一团以十多个组轮班,向连日连夜渡河的部队战士做宣传鼓动;而因为场面壮阔,水声船声与部队渡河声甚响,一般的打快板唱歌呼口号根本听不见,我们便常常出动分组的军乐伴合唱作鼓动,唱得最多的便是《黄河大合唱》的一些歌段。我当时既不知道《黄河大合唱》是何人所作,又是什么样的作品,更没有见过它的乐谱和如何演出的,我们宣传鼓动以军乐伴唱的《黄河》歌段,当然绝不是它的规范演绎,但不知怎么的,在我心里刻着的面对着真正像是从天上落下来的“奔腾咆哮如虎狼”的黄水而歌唱黄河的场景,总觉得这是最好最美的《黄河大合唱》;这也是后来我会踏上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之路,屡经挫折而无怨无悔的深层心因吧。

3. 学 Cello、当指挥都是“三脚猫”

1948年4~5月间,我在三野文工一团因为一次意外事故砸伤了脚,不能随团开赴前线而被调离,由也是因故不能随团上前线的陈晓虹大姐,把我背到新安旅行团报到。当时的我,觉得从部队文工团被“下调”到地方文工团真是丢脸之极,更为失去了向沈亚威、张锐等我心中“音乐之神”学艺的机遇而懊恼不已,所以,不管背着我的晓虹大姐一路怎么哄着我劝着我,也止不住我哭鼻子;到了新旅被编入年龄都差不多的一个组里以后,足足有十来天时间,我都阴着脸不理不睬大家。

但是,成立于1935年10月的新安旅行团,虽然在我调入的时候,也与三野文工一团等一样,主要从事着为解放战争服务的文艺宣传与歌舞戏剧演出工作,而它的以“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为宗旨,以少年儿童为主要成员与服务对象的传统,使它形成了不同于一般部队与地方文工团队的某些特色;就我来到以后的体会,由于新旅大多数成员,不是十一二三、十四五六的儿童少年,就是十七八九二十